

J&C 未名社科·新闻与传播研究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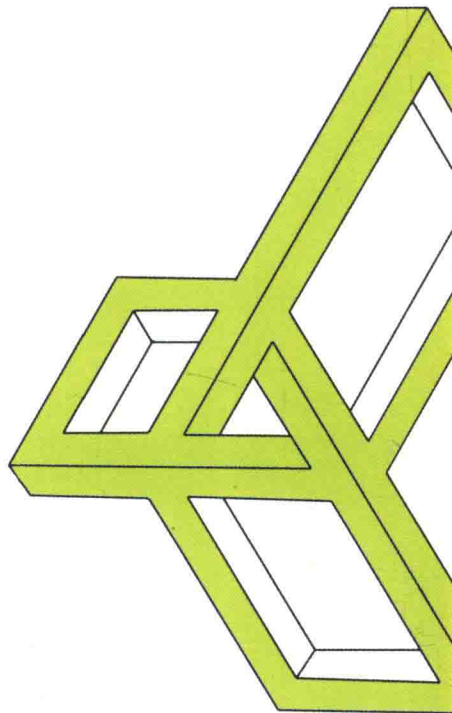
Revisiting the Gray Area

Narration and Memories
in the History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重访灰色地带

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

刘海龙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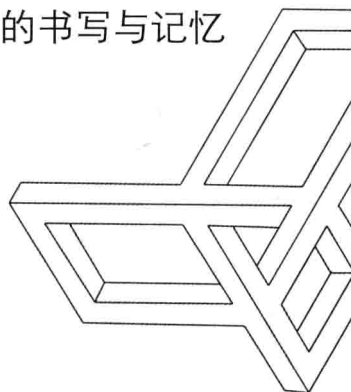
J&C 未名社科·新闻与传播研究丛书

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重访灰色地带

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

刘海龙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刘海龙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7

(未名社科·新闻与传播研究丛书)

ISBN 978-7-301-25901-6

I. ①重… II. ①刘… III. ①传播学—历史—研究 IV. ①G206-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10627号

- 书 名** 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
著作责任者 刘海龙 著
责任编辑 周丽锦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5901-6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ss@pup.pku.edu.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5016
印 刷 者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965毫米×1300毫米 16开本 13.25印张 200千字
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2.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目 录

- 导言 解放灰色地带:对传播思想史叙事的反思 /1
- 从传播理论到传播思想史 /1
- 两种传播思想史 /3
- 传播学术史的意义 /6
- 传播学术史的叙事结构 /7
- 灰色地带的生命力 /10
- 连续与断裂的辩证法 /13
- 本书的结构及章节 /16
- 第一章 拉斯维尔:被误读的传播学
- “奠基人” /20
- 缺乏传承的“卡里斯玛” /21
- 《社会传播》的5W /23
- 拉斯维尔模式≠拉斯维尔的传播观念 /25
- 注意结构研究与驻防国家 /28
- 从宣传研究到世界注意结构调查 /31
- 第二章 超越有限效果理论:哥伦比亚学派及其批评者 /35
- 在天使与妖魔之间的哥伦比亚学派 /35
- 为什么哥伦比亚学派会成为众矢之的? /36
- 哥伦比亚学派=有限效果? /41
- 为什么哥伦比亚学派会被贴上
- “有限效果论”的标签? /45
- 抽象的经验主义还是方法的多样主义? /47
- 管理学派的是与非 /51

- 丰富多彩的灰色地带 /54
- 第三章 帕克与传播研究的芝加哥学派神话 /56
- 传播研究史的话语争夺 /56
- 为什么是帕克? /60
- 连续中的断裂 /63
- 从进化论到效果研究 /65
- 断裂中的连续 /69
- 传播研究与知识社会学 /71
- 第四章 宣传的理由:被忽略的伯内斯及《宣传》 /74
- 传播思想史的学术偏见 /74
- 创造有利于“宣传”的环境 /76
- 多元主义与社会秩序 /78
- 从公众被诅咒到双向互惠 /81
- 宣传的“科学性” /82
- 第五章 中国传播研究的史前史 /85
- “传播”还是“交通”? /85
- 社会学传统的传播研究 /89
- 中国社会学者对传播问题的探索 /93
- 新闻学传统的传播研究 /96
- 断裂中的连续 /97
- 重构记忆 /101
- 第六章 孙本文与20世纪初的中国传播研究 /106
- 为什么是传播研究? /107
- 为什么是孙本文? /109
- 公众意见:从社会态度到社会控制 /114
- 社会学与中国早期传播研究 /117
- 第七章 “传播学”引进中的“失踪者”:传播批判学派
与中国早期的传播学观念 /119
- 施拉姆访华:中国传播学兴起的助燃剂 /120
- 批判理论引介的“失踪” /123
- 对抗策略:“发育不良”的实证研究 /127

模仿策略:传播学是新闻学的最新阶段? /130	
“不成熟”的社会语境还是“两难”的社会语境? /135	
第八章 从“文化工业”到“文化产业”:从关键词 的变迁看中国媒介文化研究 /140	
概念的源点:“文化工业”与法兰克福学派 /144	
“文化工业”概念在中国的发展概况 /147	
“文化工业”概念的引入 /150	
错位的批判与通过符号资本展开的争夺 /153	
从“文化工业”到“文化产业” /156	
重新定义“文化产业” /160	
第九章 寻找听众:中国传播研究中的创造性互动 /164	
新闻学者:传播研究在中国的第一批听众 /165	
理想的听众和实际的听众 /168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传播研究在经济领域的新听众 /170	
听众还是委托人 /173	
学术独立与多元的听众 /175	
第十章 从受众研究看“传播学本土化”话语 /178	
从应然到实然:两种“传播学本土化” /178	
中体西用:三种受众研究 /180	
暧昧的“传播学本土化”话语 /184	
第十一章 传播研究本土化的两个维度 /187	
本土化焦虑的产生 /187	
本土化问题的提出方式 /189	
充满争议的本土化标准 /192	
本土化话语背后的张力 /196	
多元竞合的本土化 /202	
后记 /205	

导言 解放灰色地带:对传播思想史叙事的反思

从传播理论到传播思想史

传播理论教材中在传播研究历史部分基本是千篇一律:19世纪末社会科学出现,19世纪20世纪之交美国社会的状况,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战、魔弹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诞生传播研究,拉扎斯菲尔德、卡茨等人提出两级传播与意见领袖,并进而由克拉帕提出有限效果论,否定了魔弹论,60年代末以议程设置为代表的宏观效果理论兴起……

但是,这条看似连续的线索有太多缺失的链条。这是一个缺乏意义解释的“编年史”,仿佛一切事件都是理所当然地处在属于自己的位置,但是它们为何这样分布,却少有人追究。这种不求甚解、似是而非的状况从课堂延续到了研究中。对西方传播研究史和研究逻辑的误读导致了大量“双重去历史化”的学术废品。^①这类研究由于不清楚西方理论的来龙去脉,错误理解了其解释效力,将其普遍化;同时又无视中国现实,削足适履,将中国经验塞入水土不服的西方概念与理论之中,制造出一具又一具“弗兰肯斯坦”的怪物。

^① 许纪霖、罗岗:《启蒙的自我瓦解:19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重大论争研究》,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版,第333页。

公平地说,自1978年传播学^①作为学科被正式引进中国内地后,“系统了解”一直是中国学者的主要研究课题,成果不可谓不多。可在如何了解方面,却一直不得其法。直到最近,才渐窥堂奥。这一探索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把传播理论作为科学的客观式解读、把传播理论作为西学子系统的系统式解读、把传播研究作为社会实践的知识社会学解读。

第一个阶段大致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至90年代中期,继承了五四以来的“唯科学主义”精神^②,把传播研究当作客观的科学发现,以仰视立场,亦步亦趋地理解。刚经历十年政治动乱的新闻学界试图摆脱“左”的束缚,去政治化的愿望强烈,导致更像“科学”的量化研究成果被重视。与此同时,这种不加批判的科学图式将传播理论视为放之四海皆准的普遍规律,学习者忽视理论产生的语境,将其结论直接应用于中国现实,出现了用“中国经验”去验证“西方理论”的后殖民式的研究。

第二个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头十年,是伴随着学术交流的深入和对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进一步理解而逐渐出现的。研究者意识到学术语境的重要性,了解到作为十字路口的传播研究有大量资料来自其他历史更悠久的学术传统,于是开始将传播研究放到整个西学的理论谱系中,探索其来龙去脉以及和不同学科的隐形勾连。但是研究者的基本立场仍然是以西方为中心,系统理解只是为了使第一阶段的学习更加全面与深化,批判性仍然有所欠缺。

近年来关于西方传播理论的研究进入第三个阶段,除了学术语境外,社会语境更受到瞩目。研究者不再把西方传播研究看成中立、客观的学术活动,而是将其视为受到意识形态影响的社会实践。如果说在前两个阶段,西方的传播理论被看作有待学习的客观知识的话,在这一阶段,它们则被客体化为知识社会学的研究素材或知识考古的史料。知识的神圣面纱被掀去,被置于权力的透镜下仔细剖析。以胡翼

① 作为研究问题的传播研究早在20世纪初就已进入中国,但是由于我们固守施拉姆的传播学定义,竟长期忽略了上述历史。详见本书第五章。

② [美]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雷颐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青的研究为例,如果说《再度发言:论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是第二阶段的典型之作的话,那么《传播学科的奠定》则已经具备了第三阶段的特征:通过观察学科体制化的过程,对传播学经验学派的知识最终建立霸权的过程做了精彩的阐述。^①

知识社会学曾经一度 and 传播研究走得非常近,后由于主流传播研究走向实证主义和琐碎的经验研究,二者分道扬镳,但在今天它们又在传播研究的学术反思和学术自觉中重新走到一起。一旦把知识本身作为问题,传播研究便可将自身的发展过程也置于传播研究的考察对象之列。像传播理论从西方到中国的旅行可以被视为跨文化传播和创新扩散的典型个案,西方传播理论在中国经历的解读可被视为受众与文本间的协商过程,传播学在中国学术体制中的正当化也可被放在传播者与学术受众的关系的视角下加以解读,甚至还可以用政治经济和文化霸权的角度来解释西方理论在中国的被收编与驯化。^②如此一来,传播理论的批判光芒照向自身,中西传播研究本身也可以作为传播研究反思与批判的对象。这便从被动地接受西方传播理论,进入到自觉的传播思想史的研究领域。

两种传播思想史

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是对人类观念的历史研究。宽泛地看,它可以被视为观念史(history of ideas)的同义词。它们关注的都是人类思想的演变发展历程。而且观念史与思想史这两个概念在开始出现时,都指哲学史和科学史这类关于正式知识(formal knowledge)的研究,准确地说是学术思想史。20世纪后半叶受年鉴史学派、新文化史等史学思潮的影响,它们开始与文化史研究走得更近,不仅关注传统观念史的研究对象,还关注日常生活和非正式知识的历史。渐渐地,学术思想史向着文化史思想泛化,研究对象在学术观念史的基础

^① 胡翼青:《再度发言:论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7年版;胡翼青:《传播学科的奠定:1922—1949》,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2年版。

^② 分别见本书第九章、第十章、第八章。

上大为扩展。但从历史沿革上看,思想史是由观念史逐渐扩展而形成的。^①除此之外,与思想史接近的还有一个更细分化的领域——概念史(history of concepts)。该领域起源于德国的《历史中的基本概念》,它受语言学影响较大,试图在共时的和历时的两个维度上理解某一概念的演化过程。^②观念与概念略有不同。按照诺夫乔伊的说法,前者是构成思想的最小的基本单元,他称之为单元—观念(unit-ideas),它是基本的、持续不变的、反复出现的思想元素。^③而概念则是一种语言学单位。一个语词概念可能是多个单位—观念的混合物,一个观念也可能被表达为多种不同的概念。此外,概念要比观念更直观和具象。观念可能是模糊的,潜藏于话语之后,而概念则是明确在场的标签和表达的工具。

具体到正在形成中的传播思想史研究,可以将其分成狭义和广义两类。前者是传播学术史,主要关注传播研究和传播学科发展史中的观念、概念、命题、理论及学说的演变过程,同时兼及持有这些思想的个人或群体(如学术派别)。除了罗杰斯的《传播学史》^④外,詹姆斯·凯里对传播思想史也有过一系列精彩的专论^⑤。他的学生切特罗姆的《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⑥、贝尔曼的《芝加哥学派社会思想中的传播观念》^⑦、卡蒂尔的《威尔伯·施拉姆与美国传播理论起源的观念史》^⑧对美国传播观念的起源有过专题研究。彼得斯的《交流的无

① Donald R. Kelley, "Intellectual History: From Ideas to Meanings," in Nancy Partner and Sarah Foot, eds., *The Sage Handbook of Historical Theory*, London: Sage, 2013, pp. 81—92.

② [英]伊安·汉普歇尔-蒙克:《比较视野中的概念史》,周保巍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③ [美]诺夫乔伊:《存在巨链:对一个观念的历史的研究》,张传有、高秉江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④ [美]E. M. 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殷晓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

⑤ Eve Stryker Munson and Catherine A. Warren, *James Carey: A Critical Reader*,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

⑥ [美]丹尼尔·杰·切特罗姆:《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从莫尔斯到麦克卢汉》,曹静生、黄艾禾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版。

⑦ Sheldon Larry Belman, "The Idea of Communication in the Social Thought of the Chicago School," Unpublishe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1975.

⑧ Jacqueline Marie Cartier, "Wilbur Schramm and the Beginnings of American Communication Theory: A History of Ideas," Unpublished Dissertation, The University of Iowa, 1988.

奈》对“传播”这一观念在西方思想界的变迁做了精彩的梳理。^①丹·席勒的《传播理论史:回到劳动》^②、汉诺·哈特的《传播学批判研究:美国的传播、历史和理论》^③和文集《媒体与传播研究史:竞争的记忆》^④则是更有批判性的学术思想史研究。近些年来,中国本土的传播思想史研究的成果也不少,主要集中在学术思想史领域,黄旦、陈卫星、吴飞、胡翼青、孙黎等皆在该领域有出色成果。

广义的传播思想史不仅关注学术思想,还关注一般传播观念的起源、传播、接受及其影响,尤其是日常生活中传播观念的历史。像舒德森的《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一书讨论了新闻观念的变迁及新闻客观性观念的产生^⑤,近年来黄旦教授的一系列研究也在关注中国近代以来媒介对中国人的表达、思维方式及知识结构的影响^⑥,拙作《宣传:观念、话语及其正当化》则描述了中西方宣传观念的产生及演变,重点研究了宣传将自身正当化的过程^⑦。如果我们接受柯林武德关于“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⑧的说法,那么新闻史和传播史归根到底都应该关注作为行动者的新闻及传播工作者的观念与思想,而不是仅仅描述他们的行为或者作为行为结果的媒介产品。目前这一类研究在国内还刚刚起步,未来应该有更大的拓展空间。

① [美]约翰·彼得斯:《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何道宽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

② [美]丹·席勒:《传播理论史:回归劳动》,冯建三、罗世宏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③ [美]汉诺·哈特:《传播学批判研究:美国的传播、历史和理论》,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④ David W. Park and Jefferson Pooley, eds., *The History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Contested Memories*, New York: Peter Lang, 2008.

⑤ [美]迈克尔·舒德森:《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陈昌凤、常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⑥ 黄旦:《耳目喉舌:旧知识与新交往——基于戊戌变法前后报刊的考察》,《学术月刊》2012年第11期。

⑦ 刘海龙:《宣传:观念、话语及其正当化》,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3年版。

⑧ [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传播学术史的意义

由于传播文化思想史涉及的问题比较复杂,受篇幅所限,此处主要讨论传播学术史。传播研究本身是一个实践性和应用性极强的领域,权力和实用理性深深地渗透在传播研究之中,学科的自治性低。本研究力图在一个更广阔背景下,反映20世纪以来中西方传播研究的内在逻辑。

传播学术史的研究还有另外一层重要意义。由于传播学科的特殊性,知识与权力、知识与实践的联系在此表现得尤为突出,可为知识社会学研究提供典型个案,其价值超越了传播学术史研究本身。从起源上看,传播学的研究目的、对象与意识形态关系密切。最近的研究发现,美国传播学之所以能够在短期内脱颖而出,蓬勃发展,不单纯是学术逻辑自然发展的结果,更是战争宣传、冷战及社会控制的需要。^①与其他学科相比,它更容易受到权力的干预。

传播研究之所以能够迅速成长为学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能回应实践的需求,具体来说就是以效果研究的名义,协助各种权力机制完成社会控制,比如民意测验、选举调查、受众调查、广告调查等。传播研究从一开始就不是在象牙塔里完成的工作,它往往接受来自政府、军方和企业的资助与订单。它要密切关注传播实践,考虑研究成果的现实转化。实用的功利逻辑渗透到了学术逻辑之中,不仅影响到研究问题的设置,甚至影响到了对数据的解释。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吉特林曾指责《人际影响》在研究结论中有意忽略某方面的证据,以迎合赞助商的需求。^②在传播学在中国的扩散及其后续研究中,功利逻辑的影响更是无处不在。究其根源,不能不归因于学术管理者对“理论联系实际”的庸俗理解和整个社会盛行的工具理性之风。例如,在传播研究诸领域中,唯

^① Jefferson Pooley, "The New History of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David W. Park and Jefferson Pooley, eds., *The History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Contested Memories*, New York: Peter Lang, 2008.

^② Todd Gitlin, "Media Sociology: The Dominant Paradigm," *Theory and Society*, 6(2), 1978, pp. 205—253.

有受众研究最为繁荣,但是在理论建构方面却乏善可陈。^① 反思这类现象,不仅对于传播研究有帮助,对于整个学术界可能也有启发。

由于传播研究缺乏自治并导致学理匮乏,自20世纪40年代诞生起,传播学便一直处于“正当性赤字”之中。为了填平这一亏缺,大量学术史话语被生产出来。尤其是经验学派为了肯定既有学术体制与研究范式的正当性,在学术史的书写中渗入该学派的意识形态,这些话层层堆积,构成了主流叙事的神话,其中有代表性的便是施拉姆建构的“四大奠基人”神话和以此为基础的罗杰斯的《传播学史》。中国学界曾经不加分辨地把它们当成客观事实加以接受。不仅如此,对学术史叙事缺乏自觉的中国传播学界自己也生产了大量未经反思的学术史叙事。通行教材中为了论证当下合理性,对进步充满乐观的“辉格党式”的历史叙事随处可见。

传播学术史的叙事结构

有鉴于此,书写传播学术思想史,当务之急是解构这些被神话包裹的主流宏大叙事。这些神话包括两个层次,一是叙事的素材,包括概念、理论、人物、学派等,二是叙事结构。关于前者,本书正文将深入做一些个案研究,这里主要讨论之前未曾涉及的第二个问题。

关于历史文本的叙事结构问题,最著名的研究莫过于海登·怀特的《元史学》。受20世纪中期流行的结构主义和语言学、叙事学的影响,怀特认为历史叙事和文学叙事具有相同的特征,都是语言创作。这些修辞的结构并非历史事件固有,而是历史学家在叙述时加入的主观元素。怀特将历史中的叙事结构总结为情节化模式、论证模式和意识形态蕴涵模式三个维度。^② 怀特所讨论的历史叙事偏重历史事件,

^① 见本书第十章。

^② [美]海登·怀特:《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陈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怀特的理论也受到一些学者批判,后者认为叙事并不是在历史编撰过程中形成,而是在历史事件被记录时就存在的共识元素,是运用“存在于未来的回溯点来回顾现在”,因此叙事与真相存在相同形态。相关讨论见[英]迈克尔·斯坦福:《历史研究导论》,刘世安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版,第84—88页。

学术史的叙事未必可简单挪用。然而仿效怀特的做法,我们也可以在现有的传播学术史叙事中发现类似的固定结构。总结起来,在现有传播学术思想史的编撰上存在如下五种主要结构^①:

1. 编年式结构。严格来说这类叙事还算不上有意义的故事,它只是按时间顺序罗列重大事件,并不诠释其意义,似乎事件本身便会诉说一切。在这种叙事结构中,传播学术的发展由一系列碎片事件简单缀连而成,这里面既看不到具体的人的行动,对于由事件构成的网络关系也缺乏描述。比较典型的是大部分传播学教材中对中外传播学发展历史的叙述。但是即使是这种看似客观的事件排列,通常也不是完全随机的和无意义的,它隐含着进化论和目的论的意识形态。所有被选中的事件,均与今天的现状存在着某种直接或间接的因果关系。

2. 里程碑演进式结构。这种结构与编年式结构很接近,不同的是编年式结构对事件的罗列更加全面,不仅有研究成果还有重大事件,而且叙述得比较简略。而里程碑式的结构以一定标准遴选符合某种范式的重要研究成果加以详细叙述。其代表性作品为洛厄里和德弗勒的《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里程碑》,选取了十四个具有较大影响的经验性的效果研究来展现传播学经验学派的发展历史。这种结构中的进化论意识形态比编年式结构表现得更加突出,而且有意无意地强化了经验研究的正当性。例如书中在比较经验研究与“文化批判”时指出:“选择文化批判观点的研究者所取得的成绩还远远谈不上明晰。然而,要文化批判学者们以本书这种叙述方式来总结其观点或许还为时尚早。”^②

3. 大师主导式结构。这类叙事比较突出研究者个人在学术发展中的作用,认为传播学术的发展由少数学术大师推动。他们个人的故事就构成了传播学术发展的脉络。比较典型的是施拉姆创造的“传播学四大奠基人”的叙事,其将传播学的产生归结为拉斯维尔、拉扎斯菲

^① 以上分类中的一些名称受到林丽云教授的启发(见林丽云:《台湾传播研究史:学院内的传播学知识生产》,台北:远流图书公司2004年版),但研究的问题略有不同。林丽云针对的是传播学史的研究进路,本书讨论的是传播研究史的叙事。

^② [美]希伦·A.洛厄里、梅尔文·L.德弗勒:《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里程碑》,刘海龙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66页。

尔德、勒温和霍夫兰四人的贡献。^① 施拉姆的弟子罗杰斯虽然并不完全认可“四大奠基人”的说法,但仍然继承了施拉姆的叙事结构,将传播学术发展化约为研究者个体的行为,忽略了社会结构和学术场域的作用。^②

4. 学派冲突式结构。传播研究内部分成不同的学术传统,它们在不少地方存在分歧,经常处于竞争与冲突状态。比如阿多诺在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研究局时与拉扎斯菲尔德的冲突便是传播学史上经常被津津乐道的批判学派与经验学派之间矛盾公开化的轶事。此外,美国学者詹姆士·凯里还建构了李普曼与杜威的争论、芝加哥学派被哥伦比亚学派取代的叙事。^③

5. 观念统领式结构。这种学术史以一个观念为中心,考察其在传播研究中的表现与演化过程。典型的是约翰·彼得斯的《交流的无奈》、丹·席勒的《传播理论史:回归劳动》和汉诺·哈特的《传播学批判研究:美国的传播、历史和理论》三个研究,分别围绕着传播、劳动和批判研究三个观念重建了传播研究的历程。^④

以上叙事结构偏重于素材的排列方式,胡翼青在《传播学科的奠定》的导言里还谈到了目前传播学史中的另一种意识形态的元叙事,即辉格史观。这种叙事的特征是将当下作为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以一种进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学术变迁,其结果则是沾沾自喜,肯定了现状的合理性。^⑤ 在上述前三类元叙事中,也多少渗透着这种意识

① Wilbur Schramm, Steven H. Chaffee, Everett M. Rogers, eds., *The Beginnings of Communication Study in America: A Personal Memoir*,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1997.

② [美]E. M. 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殷晓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

③ [美]詹姆斯·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媒介与社会”论文集》,丁未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James W. Carey, “The Chicago School and the History of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Everette Dennis and Ellen Wartella, eds., *Americ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The Remembered History*, Mahwah: Lawrence Erlbaum, 1996, pp. 21—38.

④ [美]约翰·彼得斯:《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何道宽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美]丹·席勒:《传播理论史:回归劳动》,冯建三、罗世宏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美]汉诺·哈特:《传播学批判研究:美国的传播、历史和理论》,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⑤ 胡翼青:《传播学科的奠定:1922—1949》,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2年版;[英]赫伯特·巴特菲尔德:《历史的辉格解释》,张岳明、刘北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

形态。

总的来看,这些叙事方式的主流是维护现有学术体制的合理性,强化经验效果研究与管理研究(administrative research)的主导地位。有个别突出冲突的叙事力图挑战现状,但也因为采取了一种与主流叙事类似的二元对立的结构,在反对主流叙事内容的同时,又将要否定的对象置于中心地位,从而实质上肯定了主流叙事的正当性,并未真正打破主流叙事的霸权地位。

灰色地带的生命力

要真正挑战传播学术史主流叙事的统治,除了将它从前门赶出去外,还要防止它从后门偷偷溜回来。不仅要对其内容进行直接批判,更关键的是从根本上颠覆其叙事结构。传统主流叙事的一大特征是追求宏大叙事,以一个维度或主题统摄传播学术史的整个过程。这种历史主义的叙事把学术发展的复杂逻辑简单化为一个平面,并为其发展预设了目标。简单地讲,就是所有学术研究都在朝向一个方向进步,其结果就是证明当下的或作者心目中的某个理念的正当性。除了以施拉姆为中心的经验研究的传统如此叙事,批判学派无意中肯定了这一策略。例如丹·席勒的《传播理论史:回归劳动》虽然提醒读者注意过去被忽略的传播研究中的劳动维度,但是却意欲以“劳动”取代之前居于统治地位的“效果”,以同样的逻辑排除了其他维度。汉诺·哈特的《传播学批判研究:美国的传播、历史和理论》则片面地理解了哲学中的“批判”概念,将其庸俗化为思维的“批判性”,对传播学术史做了单维度解释。

这种把历史变成哲学或社会科学注脚的做法,最终受损的是历史的丰富性和人文关怀。对于学术史来说,回到历史,重建学术演化过程的复杂性,其目的不仅仅是了解我们走过的道路,更重要的是寻找历史中蕴含的其他可能性,为今天的研究带来新的思路。与此同时,将学术史放在思想史下研究,在我们的头脑中复活过去学人面临的问题、困境与思考的脉络,同情地理解、把握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这既是一种必要的学术训练,也丰富了当代人的学术体验。

当然,回避体系化的叙事未见得就能摆脱宏大叙事,除此之外还需要借助新的叙事策略帮助我们抵抗主流叙事的霸权。为此,我更愿意尝试反讽的叙事来达到上述目标。反讽的叙事最突出的特征是放弃了以简化的方式对学术史打包概括的野心,转向寻找既有的主流叙事中蕴含的矛盾与缝隙,发现被意识形态掩盖或歪曲的问题,并以此为线索,展现整个话语系统的固有缺陷。在之前的系列研究中,逐渐形成了一个传播学术史的“灰色地带”的概念。

所谓“灰色地带”,并不是日常语言所说的“是”与“非”之间的模糊地带,它只是一种中立的描述,并不带价值褒贬。它是相对于之前学术史叙事中所呈现的秩序感而言的。上述秩序感的获得常常建立在武断的分类体系和线性的过程描述之上,最终产品是黑白分明、壁垒森严的僵化概念体系和似是而非的因果关系。所以这里的“灰”,指的是在宏大叙事中无法被归入非“黑”即“白”的分类体系之中的那些模糊的、暧昧的对象,是宏大叙事中被有意省略或遮蔽的个人与事件,即那些令人尴尬、无法被嵌入到某个连续事件流的“个案”和“特例”。因此对灰色地带的重新发现,不是对传统叙事内容的直接否定,因为如上所论,那种方式使得被否定对象仍然居于叙事的中心,仍然强化了其地位,甚至肯定了其叙事方式。相反,这种取向是通过迂回的方式,把注意力转向被忽视或收编的“异类”,通过它们的发言,打破传统叙事方式的霸权,找到新的话语表达方式,从而更彻底地否定单维度的主流叙事。

“灰色地带”不是“陌生地带”。它不是新近才被发现的(尽管它并不排除新证据),而是我们熟视无睹、被主流话语收编的那些部分。所以解放灰色地带的方法,并不是像罗杰斯在《传播学史》里所做的那样,将传播学的边界向外无限扩张,发掘那些过去不属于传播研究的人或事件(在某些时候这种做法也是必要的),而是回到我们熟悉的区域,向内审视传统宏大叙事中被忽略的断裂之处。正如诺夫乔伊所言,每个人或群体那里都有一些大众共享的思想默契,因为太过理所当然,它们甚至不会出现在文本之中。这些思潮在资质普通的学者身上体现得更明显,而那些卓越者却往往特立独行,敢于打破这些共识,在他们身上这些特征反而比较少。但是在传统观念史研究中,常常忽